荆史钩沉

袁宏道：一杯楚酒里的性灵独白

□ 余波

盛夏午后，当热浪裹着醇厚的酒香，在雕花木窗外蒸腾，弥市古镇的蝉鸣，被酒甑冒出的热气浸润得绵软悠长。荆州市文创产业协会的城市会客厅座谈会如期在弥市虎桥酒庄举行。

我则站在仪狄青铜雕像前，这位夏禹时代的造酒官，我国最早的酿酒人，衣袂间凝固的酒痕在指尖下泛着幽光。我的目光掠过他手中陶甑的纹路，忽然听见四百年前袁宏道掷杯长啸的余韵——这位以“独抒性灵”震动晚明文坛的公安才子，正踏着《觞政》的书香酒气，从墙上古朴的楚简文字中走来。

仪狄这位传说中“始作酒醪”的先贤，用青铜器皿封存了华夏酒脉的基因；而袁宏道则以笔墨为曲蘖，在《觞政》十六则中酿出性灵的琼浆。一部借酒桌规矩寻求心灵自由的哲学书，让我们看到了楚酒与性灵思想的柔美碰撞。

细读袁宏道的《觞政》，表面看是教人怎么喝酒的雅致指南，内里却是一部借酒谈心的生活智慧书，映照着晚明文人真实的精神世界。他列举“酒有十乘”的美好情境，也设下“五合十乖”的饮酒条件，乍看规矩不少。但这套规矩的深意，恰恰是为了打破更沉重的枷锁——那些束缚人心的礼教。他细细描绘“醉有所宜”的十二种境界，从“醉月宜楼”到“醉知音宜吴儿清喉檀板”，核心不是要框住人，而是想找到一种符合人本性的、真诚的饮酒方式。就像他在文坛上痛斥复古派生搬硬套古人一样，在酒桌上，他也反对虚情假意的酒礼客套，主张喝酒也要“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”——发自内心才痛快。想想看，月光洒在酒杯里，清风吹过耳边，酒就不再只是解渴的水，它成了连接人与自然的奇妙纽带。微醺之时，既能感到天地的广阔，也能觉出自身的渺小，心灵反而在陶陶然中变得清澈、自由。

开篇他就说：“凡饮以一人为明府”。这“明府”不是官老爷，而是懂酒、懂情、真正有趣的人——酒量或许不大，但兴致极高。他又严厉列出“酒忌十败”，比如“主人吝啬”、“客人轻视主人”、“争论不休”等，把酒品看作人品的镜子。在那个等级森严、礼教繁琐的晚明，这些主张简直是惊雷。他厌恶酒桌上的假客套、穷讲究，呼唤真诚、随性的饮酒氛围，认为酒桌就像文坛，只有挣脱了陈规旧习的捆绑，才能流露出最本真、最鲜活的生命力。这种追求自由的用心，甚至藏在他对酒杯的讲究里。玛瑙盏盛着松醪春酿，犀角杯、玉斝对应着不同心情、不同性格的人。这不光是玩赏器物，更是把内心的感受寄托在实实在在的东西上，暗合他文章要“各极其变，各穷其趣”的主张。酒令是酒局的核心，他看重的是“妙令无苛酌”——巧妙有趣但不强人所难的酒令，能让大家以文会友，真心交流；他反对“强作欢颜”的应酬。这和他文学上反对模仿、崇尚真情的理念，完全相通。

在虎桥酒庄的酿酒车间，看老师傅翻动冒着热气的酒醅，动作熟练得像在举行古老的仪式。那一刻，《觞政》里“酿先良米，水必甘泉”的话，忽然有了生命。酿酒如同写文章，真正的好酒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必须是上好的粮食遇上甘甜的水，再经时间沉淀、匠心打磨，才能醇香四溢。

“饮时不得强劝，罚时不得疾怨”——《觞政》里这条简单的酒令，正是“不拘格套”性灵说的最好注解。袁宏道深恶酒席上的虚情假意，就像他鄙视文坛上只会模仿古人的风气。在他心里，酒局就该是朋友们敞开心扉、畅所欲言的地方，而不是攀比钻营的名利场。这种对酒局的理想，催生了他独特的“醉态美学”。他把喝酒的人分成“酒仙”、“酒徒”、“酒鬼”，描述“醉将宜击钵，壮其神也”等情境，目的不是教人怎么喝醉，而是为不同性格的人找到表达真性情的自由空间。他推崇的“真醉”，是把喝酒升华成一种“痛快活出生命本真”的精神仪式，当别人还在借酒浇愁时，袁宏道已在《觞政》里，把醉酒提升到了精神自由的高度。

公安三袁兄弟的饮酒各有风格，展现着性灵文化的生长。大哥袁宗道，性情稳重，酒量也最好。他喜欢酒后竹林漫步，与朋友边喝边聊，享受那份宁静。他在《夜酌》里说：“醉后发清言，往往谐真趣”——短短十个字，道出了酒的神奇：洗去俗世的尘埃，让深藏心底的真知灼见自然流淌。

老三袁中道，最为豪放不羁，“呼酒赓歌，意态飞扬”是他的招牌。《醉后》诗里那句“兴来落笔摇五岳，醉后狂言惊四筵”，字字透着狂放，正是性灵挣脱束缚、纵情驰骋的绝好证明。酒对他来说，是打开心门的钥匙。

袁宏道酒量最小，常笑称“酒不能一蕉叶”，却最懂酒中真味。他在《湖上小集》里说：“呼酒与君饮，酒尽须再沽。莫言饮不多，中自有江湖”。浅饮微醺，杯中竟藏着比江湖更辽阔的心境。他的酒道，不在喝多少，而在用心体会酒带来的精神愉悦和生命感悟。

三兄弟的酒风，合奏出性灵说的三重旋律：袁宗道的“醉后清言”，是性灵的沉思内省；袁宏道的“浅饮藏江湖”，则是性灵的通透豁达；袁中道的“醉后狂言”，是性灵的奔涌释放。酒于他们，早已不是解渴之物，而是打开精神枷锁的钥匙。在微醺的暖意里，礼教的绳索松动了，属于个人的真性情破茧而出。

酒能滋养性灵文化，根子深埋在历史土壤里。《觞政》推崇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这类当时不入流的“通俗”小说，甚至把它们和酒令并列为“逸典”，这可不是随意之举，这是袁宏道重新定义酒文化的玩法，把市井的热闹也纳入文人的审美，正和他文学上主张“代有升降，法不相沿”（时代在变，法则也要变）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。当他写下“饮喜宜节，饮劳宜静”，谈的不仅是饮酒分寸，更是在描绘一种融合雅俗、回归本真的生活艺术。袁宏道笔下“醉花宜昼，醉雪宜夜”的美景，说到底，是心灵与自然借着酒意深情相拥。醉卧花丛，沐浴阳光；独对雪夜，享受宁静。可见，性灵文化能冲破复古的牢笼，在晚明独树一帜，酒，功不可没。

暮色浸染陶坛时，文创协会的研讨声与酒香交融。荆州市文创协会的专家们正激荡着“洞察创意引擎、重构品牌文化”的思维火花。仪狄青铜像的酒痕与三袁诗稿的墨香在空气中交融，为楚酒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提供了绝佳解读。

若以"性灵三境"重构楚酒品牌——“独酌”系列可取袁宏道《荆门道中》“孤光射酒卮”的孤绝诗意，用青瓷冰裂纹酒器承载虎渡河畔苦荞的凛冽，让都市人在独处时与古人对话；“雅集”系列当复现袁中道笔下《游高梁桥记》中江陵春宴的曲水流觞，以九宫格漆器盛放五色楚地风味，重现文人酒社的风雅；“狂歌”系列则可解构袁宏道《狂歌行》的癫狂气韵，为年轻一代打开释放的出口。虎渡河畔的“虎渡晴帆”

包装上的诗句不再是简单的引用，而是让“醉后发清言”成为每一次开启酒盖的仪式——当指尖抚过瓶身烫金的《觞政》片段，当手机扫描酒标浮现三袁饮酒的故事，楚酒便不再是液态的粮食，而是可触碰的文化记忆。就像宏道当年在酒局中破除陈规，今日的楚酒亦需在文创浪潮中找回“真”的魂魄：不是对古法的机械复制，而是让性灵文化在当代生活中重生。

晚风掠过“虎渡晴帆”的立柱，虎桥酒庄仪狄像在灯光下愈发温润，仿佛在凝视着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重逢。袁宏道若能看见此刻，或许会笑着说“此中真意，不足为外人道”，眼底却藏着期许——他期待着，这盛满性灵的酒盏，能在现代人举杯的刹那，唤醒被都市喧嚣尘封的本真自我。楚酒的琥珀光里，沉淀的不仅是粮食的精华，更是千年酒魂与性灵精神的共振。这杯穿越时空的酒，终将在文创的催化下，酿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佳酿。

翰墨荆楚㉙

幽肠小路百转回，清闲村落不染尘。　（作者　李小白）

楚史杂谈

为什么楚庄王能成功平息斗椒之乱

□ 余大中

公元前606年，楚庄王观兵周疆、问鼎轻重；次年，他又成功平息斗椒之乱。这一事件不仅终结了叛乱，更重塑了楚国权力结构，为日后跻身“春秋五霸”扫清了内部障碍。

笔者曾著《为什么楚国若敖氏令尹世家由盛而衰》一文，回溯若敖氏的历史。若敖氏是春秋时期楚国最具代表性的宗族，在楚国历史上地位重要、影响深远。其源头可追溯至西周末年至东周初期的楚国君主熊仪，他于公元前791年至公元前764年在位27年，去世后葬于若敖，故被尊为“若敖”，是楚君中首位有谥号者。熊仪娶鄂国女子为妻，生子斗伯比，斗伯比与其同母兄弟后世称为若敖氏，后又衍生出斗氏和成氏两个支系。自斗伯比起，若敖氏先后有九人担任楚国令尹，堪称“令尹世家”，其发展历程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轨迹。

斗椒是楚国若敖氏令尹世家的最后一任掌权者。斗椒，字子越，一字伯棼，史料多称其为斗越椒。公元前611年至公元前605年楚庄王时期，他担任楚国令尹。公元前611年，楚国遭遇严重饥荒，庸国趁机伐楚。楚国联合秦国、巴国，令尹斗椒与大夫子贝率军反攻庸军，最终灭掉庸国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：“九年，相若敖氏。人或谗之王，恐诛，反攻王。”

公元前607年，正当楚庄王问鼎中原之际，令尹斗椒与司马蒍贾的矛盾愈演愈烈。蒍贾依仗楚庄王的支持，多次诽谤斗椒。斗椒本就性格傲狠，不愿坐以待毙，于是召集族人预谋反叛。公元前605年，斗椒率领斗氏武装囚禁并诛杀蒍贾，随即出兵进攻楚庄王，史称“斗椒之乱”。

楚庄王得知叛乱后，派大夫苏从前往斗越椒军营求和，并提出赦免其罪行。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记载：“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，弗受，师于漳澨。”对于“三王之子”的具体所指，史家存在争议：一说为楚国三位先王（如楚文王、楚成王、楚穆王）的直系后裔，一说泛指楚王室的重要宗亲。但斗椒拒绝和谈，秉持“耻为令尹，非望赦也”的态度，决心与楚庄王决一死战，随后率军在漳水之滨列阵驻扎。

历史上，斗椒以善射闻名。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记载：“秋七月戊戌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。伯棼射王，汰輈，及鼓跗，着于丁宁。又射汰輈，以贯笠毂。师惧，退。”秋季七月戊戌日，楚庄王率军与若敖氏叛军在皋浒交战。伯棼（即斗椒）向楚庄王连发两箭：第一箭射中车辕，穿透车篷后击中战鼓的鼓架，又弹落在铜钲（丁宁）上；第二箭再次射穿车篷，贯穿车盖的骨架（笠毂）。楚军见状大为恐惧，纷纷后退。

楚庄王下令撤军至随国，扬言要联合汉东诸国共同讨伐斗氏，实则暗中部署伏兵，以此麻痹叛军。楚军佯装败退，故意丢弃炊具制造慌乱假象，引诱斗椒追击。叛军长途奔袭，人困马乏，士气日渐低落。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记载：“王使巡师曰：‘吾先君文王克息，获三矢焉。伯棼窃其二，尽于是矣。’”楚庄王派人巡视军队时宣称：先君楚文王攻克息国时，曾获得三支神箭；如今伯棼已偷走其中两支，且在今日之战中耗尽了它们的威力。

斗椒追击楚庄王至清河桥，发现桥梁已被拆断。楚庄王亲自率军埋伏于桥两侧，切断了叛军的后路。斗椒隔河与楚军对峙之际，楚将养由基主动请战，提出与斗椒比试箭术。养由基通过虚张声势、运用心理战术，诱使斗椒射失三箭。随后养由基一箭射中其咽喉，斗椒当场身亡。叛军群龙无首，楚庄王乘势反击，公子侧、公子婴齐率领的两路追兵从背后杀来，叛军最终全军覆没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战国袍旅拍季持续走红的冷思考

□ 张卫平

古城墙下、博物馆里、车马阵前，身着宽袍大袖、曲裾深衣的当代“楚人”的靓影骤然增多，在荆州文化旅游部门的推动引导和媒体的助力下，一场围绕“战国袍”沉浸式旅拍热潮，正在这座鼎盛时期楚国都城所在地悄然兴起。目前，“战国袍旅拍季”已然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引擎。然而，在这股热潮的背后，却隐藏着文化失真、产业低端化等问题。荆州市作为中国“战国袍”的唯一历史源头，不应仅满足旅拍带来的短期流量，而应深挖文化内涵，推动产业化升级，努力将“战国袍”打造成荆州文旅与服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荆州“战国袍”的流行并非凭空而来，其真正的历史依据源自1982年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35件保存完好的楚国服饰。这些楚国服饰，不仅展现了战国时期楚地丝织工艺的巅峰水平，更以其独特的纹饰、剪裁和色彩，成为研究楚国服饰文化的关键实物资料。荆州马山“战国丝绸宝库”的独特地位，使荆州成为“战国袍”的唯一历史源头。

所谓“战国袍”，就是楚袍。专家认为，“袍在形制上属于“衣裳相连”的广义的深衣制服式”。按照《礼记·玉藻》里关于“纩为茧，缊为袍”的记载和郑玄的注释，袍属于长衣类并内絮丝绵的一种冬季服装。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七件袍服实物和一些楚木俑资料，为“旅拍”中的道具“战国袍”提供了非常详实的依据。

马山出土的七件“战国袍”，形制非常清楚，其基本特征为交领、右衽、直裾、长袖，上衣下裳连为一体，以锦绣缘边。沈从文先生根据衣袖结构形态的不同，将其分为“小袖式”“宽袖式”和“大袖式”三种类型。

不过，无论是哪种类型？马山出土的“战国袍”就是“棉袍”，更直白的说就是如今的“棉大衣”。如果采取“拿来主义”方式，“棉袍”肯定里不合适做旅拍的。但是，掏出里面的丝棉呢？

其实，完全不用这么麻烦！马山一号楚墓还出土了三件“单衣”。这种单衣，并非只是上衣，而是上衣与下衣的连体，类似如今的连衣裙。除了一件仅残存领缘、襟缘和摆缘外，完整的两件单衣一件是一凤一龙相蟠纹绣紫红绢单衣，一件是龙凤虎纹绣罗单衣。这两件单衣的特点是，衣的领、袖、裾和下摆缘都采用双层绣绢或较为厚重的锦、绦。在穿着时，单衣各个部位受到边缘重力的作用，而显得挺括。单衣边缘部位各种不同于面料的色彩和花纹，也具有非常好的装饰性。同时，这三件单衣和七件绵袍，大都以色彩艳丽，构图浪漫的凤鸟、龙和花草构图刺绣形成独特的风格。

目前，荆州市场上用于旅拍的“战国袍”，大多名不副实。如荆州古城东门景区周边的服饰租赁门店，绝大部分都不是楚服，主要是汉服。虽然汉承楚制，但却缺乏对楚文化服饰的精准还原或展现。这种文化失真的现象，不仅误导了游客对楚文化的认知，也削弱了荆州作为“战国袍”唯一源头的权威性。

尽管，“战国袍”旅拍在荆州风靡一时，但目前仍停留在浅层次的“打卡经济”阶段：

一是文化价值被稀释。市面上的“战国袍”名不副实，很少真正楚国服饰，基本上都是混杂了汉服甚至民国时期服饰元素的“大杂烩”，“战国袍”的文化价值被严重稀释；

二是重拍照轻文化。多数游客参与的“战国袍”旅拍，仅追求“出片”效果，而非对楚文化的深度理解。摄影师在拍摄时虽会融入楚扇等道具，但缺乏系统的历史背景解说，使得“战国袍”沦为道具，而非文化载体。

三是同质竞争比较严重。当前“战国袍”经济主要集中在服装租赁、化妆造型等下游环节，且服务内容高度同质化。因此，如果文旅部门仅陶醉于旅拍带来的短期效应，“战国袍”旅拍热很有可能会沦为昙花一现的“网红现象”。

那么，从文化热潮到产业深耕，荆州应该如何打造“中国战国袍唯一展现地”，让“战国袍”真正成为独具特色的荆州文化IP并推动产业化和品牌化的打造呢？

第一，建立“战国袍”研究创新机制。要充分发挥荆州博物馆、文物保护中心和文旅集团的积极性，联合大专院校服饰研究机构，组建专业研究团队，基于马山战国楚墓出土丝织文物建立“战国袍”形制、纹样的数字化数据库，并制定行业标准。同时，运用“古代丝织品保护生物技术”，推动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化，如复原战国提花织锦、锁绣等技艺。

第二，推动楚绣“非遗”项目与时尚设计相融合。楚绣，是“战国袍”制造的核心工艺。目前，荆州民间刺绣传承人已成功将楚绣应用于现代文创，如“对凤对龙纹”果盘、“三头凤”手机壳等。可以设立“楚服楚绣创新设计大赛”，鼓励非遗传承人与时尚设计师合作，开发兼具历史底蕴与现代审美的“战国袍”产品。

第三，构建完整产业链，培育并打造本土服饰品牌。当前荆州“战国袍”产业存在“断链”风险，高端设计、生产环节多依赖外地。可以规划建设“战国袍文化创意产业园”，吸引面料研发、服装制造、手工刺绣等企业集聚。同时，扶持本地服装企业转型，打造如“楚绣”“荆缎”等自主品牌。

第四，打造多层次文化体验，强化IP营销。荆州要超越单一的“战国袍”旅拍模式，可开发沉浸式剧场、楚礼体验课程等深度产品。例如，在古城设置“战国袍体验中心”，提供专业的历史解说；举办“千人战国袍巡游”等活动，强化城市文化形象。此外，可通过社交媒体打造“#荆州战国袍”话题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古城打卡。

总之，荆州“战国袍”旅拍热潮的兴起，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缩影，但也暴露出浅表化、商业化过度的隐忧。荆州作为“战国袍”的唯一历史源头，应该努力探索从文化热潮到产业深耕的荆州路径，超越“网红经济”的局限，推动其向产业化、品牌化方向发展。

我想，只有当“战国袍”从拍照背景升级为融合文化传承、创意设计、高端制造的价值链、产业链，荆州才能真正实现从“流量城市”到“文化强市”的跨越，让两千年前的楚人智慧在当代焕发新生，不断为荆州文旅注入新的持久活力，全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“荆州方案”。